

公務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赴歐洲蒐集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資料
考察心得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姓名職稱：陳韻如 研究員
派赴國家：英國、德國、荷蘭
出國期間：106.9.2-9.13
報告日期：106.12.12

摘要

此份出國考察報告為本院為籌辦「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赴歐洲蒐集資料並相關考察之心得報告。考察報告內容包含全程參訪各項內容說明，以及對各考察機構之簡述與觀察心得等。考察地點分別為倫敦、柏林、荷蘭等三處國際都會，主要機構包含大英博物館、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荷蘭國家博物館等，此行所訪察博物館機構均為各地之國家級博物館，對於評估國家博物館角色，提供重要助益，並兼及訪查過程中所見博物館與展示推廣教育之成效。至於此次考察調查主要任務，是針對相關機構之十七世紀書畫藏品進行內容掌握與認識，此行均得與相關主管人員進行提件研究，成果明確豐碩，對於未來進一步合作模式之商議，亦已有可行方式評估。本報告整體針對國家博物館之文化教育角色，指出國際間的新趨勢，除了既有的文創、數位或普及教育之外，更值得留意，現今成功關鍵點是在專業研究課題與展示設計之整合效度，值得國內博物館教育政策予以深入思考。

關鍵詞：博物館學、十七世紀書畫藝術、全球視野、東西文化交流、展示與教育

目 次

一、目的.....	2
二、過程.....	4
三、心得.....	21
四、建議.....	22

報告名稱：赴歐洲蒐集「奇觀：十七世紀的書畫藝術特展」考察心得報告

報告日期：2017.12.11

報告頁數：23頁

出國人員：陳韻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

關鍵詞：博物館學、十七世紀書畫藝術、全球視野、東西文化交流、國際角色、展示與教育

報告摘要：

此份出國考察報告為本院為籌辦「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赴歐洲蒐集資料並相關考察之心得報告。考察報告內容包含全程參訪各項內容說明，以及對各考察機構之簡述與觀察心得等。考察地點分別為倫敦、柏林、荷蘭等三處國際都會，主要機構包含大英博物館、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荷蘭國家博物館等，此行所訪察博物館機構均為各地之國家級博物館，對於評估國家博物館角色，提供重要助益，並兼及訪查過程中所見博物館與展示推廣教育之成效。至於此次考察調查主要任務，是針對相關機構之十七世紀書畫藏品進行內容掌握與認識，此行均得與相關主管人員進行提件研究，成果明確豐碩，對於未來進一步合作模式之商議，亦已有可行方式評估。本報告整體針對國家博物館之文化教育角色，指出國際間的新趨勢，除了既有的文創、數位或普及教育之外，更值得留意，現今成功關鍵點是在專業研究課題與展示設計之整合效度，值得國內博物館教育政策予以深入思考。

壹、目的

「十七世紀」被認為是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最後階段，至此時期，歐洲的船隊已在世界各地活動，掌知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海陸區域，這個時代可說是全球化階段的起點。歐洲各地王朝政權紛紛參與這些跨洋越洲的遠洋活動，其目標雖以經濟貿易為主軸，仍因各項往來活動而展開了促成東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歷史學者Timothy Brook的暢銷史學著作《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一書，透過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的繪畫作品，深入淺出地勾勒出這一個龐大貿易世界中的交流網絡，構造出一個既有龐大地理空間往返的全球活動，又能讓人注意到藝術文物意義的智識歷程。在其研究觀察中，中國藝術文物其實並未自外於此一網絡，例如貿易陶瓷就是經常被提出的例證。相較之下，書畫藝術在十七世紀的角色與意義，從此一全球視野而言，似乎仍有待更為深入的研究評估與考察。本次考察計畫主旨，正是以十七世紀中國繪畫藝術為主體，試圖透過前往歐洲相關館藏進行評估，同時也藉此吸取國際博物館之各項展覽與研究成果，以期於未來規劃一個具有宏觀視野、國際水準的研究型特展。

為什麼十七世紀的繪畫藝術具有獨特魅力？從歐洲藝術的角度而言，各地區藝術多少經過文藝復興潮流的洗禮，風格特色卻未必朝向同一趨勢推進，義大利之外的法國、荷蘭等地區的繪畫特色，均在十七世紀各自精采、名家輩出。其中荷蘭地區的獨特藝術價值，經過學界研究更成為現今極為吸睛的藝術品。實際上，十七世紀的中國繪畫成就同樣傑出，完全不亞於歐洲藝術成果。曾經，國立故宮博物院以「晚明變形主義畫家作品展」（1977）、「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2004）等概念為題，分別於策劃了與十七世紀藝術文化相關的展覽。前者，與歐美研究風潮同步共進，接續了高居翰(James Cahill)等學者對中西藝術交流之觀察，透過院藏作品呈現出更為多元的文化面向，除了來自西方元素的刺激之外，也將古怪奇特的「變形」視覺效果與對古代的追索試加聯繫，透過大量作品引領對於明代藝術的關注。後者，更進一步試圖說明將當時對古代藝術之熱情，如何落實於生活實用層次，在展覽中透過三個子題分別介紹古人如何藉古創新、學習乃至運用於生活美學之中，此項展覽所蘊藏的深意，堪稱是既有歷史文化教育意義，其展覽中的概念與各項文物的展現，更有對臺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深刻推展成效。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雖繼承自清代宮廷收藏，但其內容與文化意涵，如同前述所舉二項與十七世紀藝術相關的特展，均可以是超越各種狹隘身分與立場的重要滋養。這樣的重要使命，其所需要的突破關鍵與前提，雖可說是繫乎於策展理念。但是，策展並非口號，其深刻的內容與要旨，則更關乎於豐富學識、具有視野的研究能量之整合。而這些期待既需要上層的號令與支持，來自於文物機構內專業研究人力自發於藏品內的研究累積，更是重要觸媒。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的獨特藝術魅力，已然獲得多方認同，本院所藏作品的數量與特色也一直能取得國際肯定。如何於前兩次既有相當成效的展覽內容中，重新策劃一項能夠承接原有研

究能量，又可呼應國際學術新知，進而放諸全球網絡之中，形成具有更多對話的特展內容，正是現今故宮研究人員所面對的嚴峻挑戰。

基於前述理解與期待，此次本院書畫處在院方支持籌辦「十七世紀書畫藝術展」的規劃中，前往歐洲地區進行此項考察活動。相較於前兩次策展，此次的策展方向，除了接續對中西交流或古風創新等主題之外，更要標示出其與世界網絡之互動性的特色。這個世界網絡的關懷，同時也指向故宮文物在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關鍵挑戰。故宮文物的歷史文化意義，必然需要更多現代意義的研究與關懷，才更有機會與觀眾對話。因此，在內部的策展研究思考中，我們認為除了既有故宮藏品的特色之外，若能透過一項「策略合作」模式所建立的國際聯合研究策展小組，將能有效地整合更具規模的研究能量，進而發揮展覽推廣教育的成效。

所謂的「策略合作」模式，不僅是在進行各別機構的藏品借用展出，此外，還要透過各館藏品的研究人員來共同思考展覽內容與子題規劃。藉此合作過程，既能促成本院研究人員的國際學術活動之參與，也能增進國際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同行對本院的熟悉與支持。其所要展現的成果，可分為動態與靜態成果兩方面說明。動態部份，將會是特展的籌辦本身，以及圍繞於展覽的推廣教育、學術講座等，可包含各層級與對象的相關活動；靜態部分，則將會累積於相關或延伸的文字著述或出版物。若能有效整合此項合作模式，那麼，無論是動態、靜態的成果，都因為有不同參與的機構一同規劃，在設想得宜的條件下，其所展現出的成效，將可跨越地理空間上的限制、語言使用上的歧異，達到更廣泛全球的互動與對話。

本院書畫收藏的質量精采，其文化藝術上的意義更能跨越時空。此項十七世紀的特展規劃與籌設，實際上就在正視並試圖回應當今環境所給予故宮的期待與挑戰。是以，此次展覽籌劃前置階段，將於歐洲地區訪查未來合作機構、人力以及展品內容。此次考察的具體目標可從人、事、物等三方面說明。首先，針對「物」的層面而言，是在於蒐集未來籌劃展覽所需要的作品以及相關參考文物。「人」的層面，自然是在爭取共同參與策劃展覽的研究人力，並且藉機說明「策略合作」的共同參與研究策展模式，徵詢如何拓展現有的研究領域，以及研究課題所牽涉的人脈網絡。至於「事」的層次，就在說明並了解，各館不同機構之間的策展模式與要求，進而尋求在不同博物館體制內的最大合作可能方式。

這個展覽的規劃，與我們想要投入的「策略合作」模式，並非僅是短時間的單一機構之業務成果。此一合作若能建立，未來勢必能促成臺灣在文化藝術研究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從研究人力而言，臺灣地區所培育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專業人才，向來被世界一流學府所肯定，近年更有多人受聘於海外任教。此方面的成就，故宮收藏與研究人力在臺灣的藝術史教育大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絕不應被低估。這項得來不易的成果，實因故宮的性質獨特，其雖屬行政體系的一環，但長年更扮演著文化藝術之學術教育機構的角色。為能維繫甚至推展這方面的重要成就，故宮更有義務在各項業務的推行過程中，對內、對外均積極培育相關人才、建立適才任用的博物館專業環境，穩固在國際博物館中的領先位置。

貳、考察過程與說明

一、活動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城市
2017年9月2日(六)	23:40	自台北出發	
2017年9月3日(日)	10:55	抵達倫敦，赴下榻旅館後，前往National Gallery	倫敦
2017年9月4日(一)	全天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倫敦
	12:00	拜會該館中國藝術研究員張弘星先生	
2017年9月5日(二)	全天	The British Museum	倫敦
	13:00	與中國藝術研究員Yu-ping Luk博士提件研究討論	
2017年9月6日(三)	8:45	由倫敦飛往柏林	柏林
	11:35	抵達柏林，赴下榻旅館後，前往威廉皇帝紀念教堂	
2017年9月7日(四)	全天	Museum of Asian Art, National Museums in Berlin 與中國藝術主任Birgitta Augustin博士提件研究討論	柏林
2017年9月8日(五)	全天	Museum of Asian Art, National Museums in Berlin 與中國藝術主任Birgitta Augustin博士提件研究討論	柏林
2017年9月9日(六)	全天	博物館島，國家博物館	柏林
2017年9月10日(日)	12:15	由柏林飛往荷蘭	阿姆斯特丹
	13:35	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	
2017年9月11日(一)	全天	Rijksmuseum，由中國藝術研究員王靜靈博士安排版畫庫房提件，亞洲展廳	阿姆斯特丹
2017年9月12日(二)	全天	Rijksmuseum其餘展廳，以及海事博物館、冬宮博物館、林布蘭特博物館等	阿姆斯特丹
2017年9月13日(三)	全天	前往Rijksmuseum館外的庫房提件，與王靜靈博士研商可能的展覽方向	阿姆斯特丹
2017年9月14日(四)		公務考察行程結束，銜接公假自費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前往萊頓大學）	

二、活動內容說明

此次為籌劃「奇觀：十七世紀的書畫藝術特展」赴歐洲進行十七世紀書畫收藏的資料蒐集與考察活動，其所選定的機構分別位於倫敦、柏林以及阿姆斯特丹，相關拜訪機構又再分為一般參觀以及策略合作洽談等不同目標。相關的活動內容細節，依據工作日程分別敘述如下。

（一）英國倫敦（9/3-5）：

此次前往倫敦的主要洽談合作對象為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因交通時間允許，同時並拜訪考察的機構還有國家藝廊（The National Gallery）以及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 國家藝廊 The National Gallery

抵達倫敦第一日(9月3日)已是當地中午時段，下午得前往國家藝廊考察其相關展示內容與方式。國家藝廊（The National Gallery）近年成為一個十分具有文化魅力的博物館機構，其原因與2014年一部由知名紀錄片導演Frederick Wiseman執導的紀錄片（National Gallery）不無相關。Frederick Wiseman在國際電影圈屢屢獲獎，經過他作為紀錄片導演的卓越視覺敘事能力，Frederick Wiseman將這個從十九世紀已經存在的國家藝廊，脫去了它的陳舊軀殼，將一個文化機構內的價值與生命力展現於觀眾面前。不難想像，經此紀錄片影像的傳播，當代觀眾對此機構遂有更多的吸引力，我也是一位這樣的觀眾。

此次到訪，特意使用了國家藝廊所提供的語音導覽系統，其內容不僅是具有多國語言的選擇，還包含有已經規劃好的60分鐘或120分鐘的精選導覽組合；另外，使用者也能從1200件館藏中，自由選擇所需要的作品內容來自由組合。此類包含固定組合行程，或者包含許多典藏品的語（影）音導覽系統，已經是博物館教育主流，提供參觀者更為自主、且能充分掌握館藏精品的進行自助參觀行程。雖然是各館均有的服務，但其中的成效高低，仍舊是與所提供的講解內容深淺與安排有極大關係。國家藝廊的內容，就將導覽內容區分為一般及進階深入。因此，有許多進階部分，就能提供了超越一般說明文字的不同觀察角度與說明內容。也正因此，即使是多次到訪的觀眾，也能從中獲取不同的知識。

國家藝廊對於作品教育的積極作為，可見其真正用心於「導覽」教育活動，不只是語音導覽系統講究深入淺出，就連現場導覽人員也十分專業而出色。在展場考察期間，剛好見到一位館內的導覽人員正在進行定時導覽，其導覽的特色在於能夠有效地從畫面中找出描繪的細節，指引觀眾從中思考或獲取



相對應的訊息，以進而對於畫作的內容有不同的理解。這樣的導覽能力，當然需要有豐富的學識，可以想像也必須仰賴或借助學界深厚的研究成果。國家藝廊對於其典藏名品的研究與推廣顯然不遺餘力，實際上，在其官方網頁上，就提供有大量針對作品的說明與介紹文字，乃至高清圖像。而其最讓人驚艷的呈現手法，還在於其官網整體架構的規劃，有「Paintings」、「Visiting」兩項，前者可充分掌握館藏多數作品，後者，則是透過樓層分項，引導觀眾如何在館內取得所需要的作品資訊。整體目標就讓人感覺，國家藝廊像是一個繪畫資料學習庫，讓人覺得進入此一博物館，就可以輕鬆貼近並從其館藏作品群中，取得13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繪畫內容。



當然，此次針對館藏十七世紀歐洲繪畫得有進一步認識。其中，例如El Greco, ‘Christ driving the Traders from the Temple’, Diego Velázquez, ‘The Toilet of Venus (The Rokeby Venus)’, 以及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Boy bitten by a Lizard’, 所展現的人物之內心情緒與外貌型態上的張力與對比，很能引起觀眾共鳴，此外，Rembrandt, ‘Belshazzar’s Feast’ 的光影明暗與戲劇性瞬間的拿捏等，也是其藝術成就中極具代表性的成果。

2.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考察第二日（9月4日）前往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簡稱 V & A Museum)。相對過去參觀此館多以當期特展為主，此次拜訪則以其近年完成的開放庫房 Ceramics Study Galleries。此部份空間位於本館建築六樓，其概念是將館內收藏亞洲、中亞以及部分歐洲陶瓷作品，改以玻璃櫃開放儲藏的形態，提供一個收儲、展示之複合型態，達到典藏、教育並進的成效。在此展示區內，特別設計的透明櫥櫃主要置於中間，所有的櫥櫃均達近二層樓高，文物分別依據生產地區、陶瓷類型等排列收儲。玻璃櫥櫃的正中間有一通道與移動式樓梯，若有館內人員需要取用或進行整理作品，也能在不影響觀眾參觀的情況下，在中央通道內進行工作任務。

關於開放式庫房的構想，於多個國際博物館中早可見其不同作法。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Fine Art, 以下簡稱Met）也有類似的方式與構想，其中美國藝術的開放式庫房(The Henry R. Luc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Art, 或簡稱Luce Center Visible Storage)可說是十分成功的先例。



大都會博物館的美國藝術展示區，包含更多樣的美國文物，各依據材質類型先加以區分，接著按年代順序以及形式大小等進行排放文物。若是比較Met 與V & A Museum兩個機構的開放庫房之規劃，Met 方面的樓高與櫃體較低，因此觀眾容易針對各層的收儲文物進行觀察，在櫃外甚至都提供互動性螢幕讓觀眾可以進一步檢索個別文物資訊；V & A Museum的整體樓高與陳列櫃高度超過兩公尺以上，較上層的儲放文物對於一般觀眾而言也僅能是仰頭遙望，並不容易有機會瀏覽。實則，我們不難評估此二者各自具有其強項；Met 較容易觀看，更能扮演展示教育目的，然其收儲作品量有限，而V & A Museum方面顯然更能強調其收儲。



這類開放式庫房的設計，確實有其吸引人的優勢。以V & A Museum的案例而言，由於此一開放儲藏展示的內容同時包含了中亞、亞洲的陶瓷，而陳列方式又以相同造型、相近尺寸的文物成組排放，在同一展示空間中，觀眾可以經由引導而進行更具有比較視野的觀察，例如中亞的陶瓷造型與亞洲陶瓷造型之間的親近性，很容易讓觀者察覺。換言之，此類觀察或參觀經驗，若能有適當引導與說明，確實是一處得以有效的文物學習空間。V & A Museum確實經常於此一空間，進行陶瓷藝術的特別教育與導覽推廣活動。這也說明，無論何種新穎的展示規劃，若缺乏深入研究或學識內涵，文物的教育意義都會大打折扣。文物研究員的角色，必然需從一個博物館的收藏中養成，使其能參與、發揮其智識於各展示規劃之內。博物館的所有業務與其教育目標，絕無可能脫離藝術史或文物專業而存在。單憑新穎的規劃創意，若無深厚的文物知識作為養分，顯然無法稱為教育之利器。無論V & A Museum或是Met等國際博物館之各項展示，都不能自外於這樣的評估與反省。

由於V & A Museum 藏品多以工藝部分為人熟知，其書畫收藏與十七世紀主題相關性也，此次到訪並未申請提件研究。但仍與該館中國藝術研究員張弘星先生於餐敘期間，進行相關課題的討論，而得到新的合作可能之規劃構想。張博士特別建議將透過其館藏，從中西對照的觀點來協助本次故宮的構想計畫。由於本院典藏作品均屬清宮皇家收藏，對應的民間特色若能藉此增補呼應，應有更具深度的策展可能。在交流過程中，張博士已經舉出多項可能方向，

但由於牽涉其個人研究成果，不宜多有公開陳述，未來將擬實質納入策展規劃。此外，張博士近年投注於中國藝術之數位典藏計畫，其中又特別關切於關鍵詞詞彙之英語用語詞庫整理。在張博士的規劃與投入下，這一詞彙庫，已然超越了數位典藏業務的層面。他認為，中國藝術詞彙的英譯與詞彙選定，實則也是中國藝術知識體系於西洋世界的重要載體，因此正適合同時思索其中的相對應意義，並且從中評估中國藝術體系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與其發展。也正因其中具有超越典藏之上的內容意義價值，此項計畫在近年仍得到支持與重視。張博士對此一計畫的投入態度，正能用以反省國內對於數位計畫的執行與研究深度。

國內數位典藏事業經過近十年的國家型計畫後，實際上有著十分卓越的完成度。但是，所謂的數位典藏成果，卻很難只停留在初期發展階段的文物資訊數位化。正因此，國內近年力推人文數位典藏應用計畫，即是意圖將此事業推向另一個新階段的舉措。不過，這方面的成果尚有可待。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整個開發數位典藏階段，數位人員與文物專業人員之間的合作模式，仍多存在著兩方壁壘分明的情況，又或者將文物數位典藏之工作，只認識為文物圖像數位化的成效，管核主計機構又只能從這些數量化結果來思考數位典藏成效。這樣的誤解，讓國內數位典藏發展，雖具備著自2001年起的執行先機，卻遲遲無法在國際間取得具有相對應的地位。即使以歷史文獻的數典而言，無論是文獻影像數位化或文獻內容數位化，這類的



數位化發展構想已經無法滿足新一階段的人文數典目標。在國際間，特別是透過數位過程或數位工具所進行的新類型內容研究計畫，才是最新挑戰。V & A Museum 展示手法中多項利用數位工具的陳設，亦已得到許多觀眾正面迴響，值得作為本院規劃參考。

3. 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

考察第三日（9月5日），前往大英博物館與中國文物研究員陸於平Yu-ping Luk博士共同提件研究。大英博物館的中國書畫收藏估計約有五千件左右，此次拜訪陸博士，請其針對十七世紀推薦相關典藏作品進行提件研究，共計有十多件文物，此外，並就未來相關共同研究課題交換意見。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十七世紀繪畫作品中，與陸博士商量選取一些不同類型的作品為評估素材。此次選擇作品包含十七世紀不同地方畫派的畫家作品，如陳洪綬、盛茂燁、文點、王原祁，以及多件傳稱作品；在作品題材上也顧及不同畫科，花鳥、人物、山水等均有作品為例。由於考察與討論作品的實質成果，牽涉個別研究人員的研究著作權，在本次公開

報告內容中將不予以深入明確記錄。不過，對於此次交流的實質成效與相關研究議題的思考，則可有以下整體說明。

首先，是針對大英博物館書畫藏品特色的比對研究。本院書畫典藏作為清宮皇家收藏，向來被視為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典藏。這個所謂的代表性，確實建立在這些藏品之品質精良、跨越歷代的意義，不過，卻不限於此。更直接的看，經過皇家透過其至高權力所搜訪得來的書畫群，正能提供一個掌握歷代書畫內容與特色的重要樣本；而此一皇家收藏，若再進一步來看，也可說是提供理解整體書畫藝術的重要參考架構，具有一種「標尺」般的重要意義。當然，能夠掌握此一「標尺」、或精確地運用此一「標尺」將能十分有效地認識現有的書畫藝術。本院書畫收藏的此項角色，早是國際學者所共同認識。1960年代起，歐美學者陸續前後參訪臺中北溝時代的故宮或遷至臺北外雙溪的故宮書畫處，進行針對故宮書畫文物的紀錄與研究，甚至在1970年國際世界第一次的書畫討論會就在臺北故宮。

臺北故宮的書畫藏品，特別是繪畫作品方面，早已經是國際學者所公共運用之內容。這在許多80年代到90年代之間，國際重量級的繪畫史論著中一再可見本院藏品成為論述的依據。但是，近年因為清宮研究熱潮，北京與清宮更為直接相關的典藏成為主流，本院書畫藏品一段時期之圖像授權又過於緊縮而造成部分國際學者不願青睞。本院應對此「標尺」角色的思索，實應有更積極的主動作為。大英博物館的中國書畫館藏來源，主要奠基於二十世紀初期，當時正是書畫文物市場活動十分熱絡的階段，也因此其藏品有許多非典藏面貌之作，而這樣的多樣特色，正適合與本院藏品比對研究，或可說是更要借助本院藏品的標尺架構來進一步相互認識了解其館藏特色。此次的共同研究過程中，雙方均對於部分藏品的風格表現與內容意義上，有著十分具有成效的意見交換。陸博士亦將撰寫其中部分研究心得，並發表於其預計出版的圖錄論著。



其次，是針對十七世紀繪畫的多元媒材與樣式之評估。除了一般的繪畫作品外，本考察也針對版畫作品進行提件研究。這些常見於當時民間的流通藝術，確實是迥異於故宮藏品類型。但是，從畫風與樣式的發展來看，這些民間版畫的原型，仍能在本院藏品內尋得相關參考畫作。過去，對於這類圖像原型的流轉運用，已有學者從跨越媒材的藝術表現特色上進行思考，未來應可著重於樣式之流通與新創等方向重新評估。這樣的研究方向，有助於將藝術史的研究成果更推向於視覺文化層次的觀察，並且可在文化史、交流史等方面提出不同的觀察與議題，對於思考藝術普及化的課題也能有所助益。

最後，針對未來合作策劃展覽之構想，陸博士亦表達十分肯定的態度。從作品的借展、共同撰述論著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均有積極參與態度。雙方均希望能藉此次交流，得有機會深化為長期性的互動夥伴關係。在追求國際能見度的政府方針下，對於文化政策方面，筆者認為除了發掘本地的文化藝術價值之外，善用既有資源之國際地位價值，透過專業人員的交流來進行更為實質的影響力，亦不失為一個競爭本院國際地位的有效途徑。實際上，歐美各地博物館的亞洲藝術文物研究，常因經費與組織人力問題，不少機構缺乏專責人員，本院研究人員能長期於本院一流藏品中吸取經驗與知識，若能積極認識此一獨特人力資源的培育與運用，將可見於未來有深具潛力的發展。

（二）德國柏林（9/6-10）：

倫敦之後的行程為柏林，考察第四天(9月6日)為交通移動路程，自倫敦飛往柏林。午後抵達柏林，並曾前往旅館附近之威廉皇帝紀念教堂，考察其對於歷史建築的重建與展示。此趟在柏林停留的三天（9月7, 8, 9日）主要任務，是於前兩天拜訪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的新任中國藝術主任愛古心（Birgitta Augustin）博士，並與之共同提件研究。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的中國繪畫收藏十分重要，早在1992年由德國學者雷德侯教授(Lothar Ledderose)專文介紹柏林博物館在二十世紀初收藏中國繪畫契機，並說明柏林的中國繪畫收藏緣由與其重要性，此一專論後並由陳葆真教授中譯並發表於本院《故宮學術季刊》(11卷3期，1994)。而該館除了二十世紀前後的收藏成果外，陸續也在1980年代後期得到私人捐贈之書畫作品，這些近三十年之累積成果，更使此一館藏成為歐洲地區最具質量的書畫收藏。此外，由於機會難得，在柏林的行程中特別加入對於其他博物館中的相關展覽進行考察。共計在四天考察行程中，除了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提件研究之外，亦得前往考察博物館島中的其他相關機構與展覽等。以下分項說明。

1. 柏林亞洲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9月7與8日兩天均在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庫房提件。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前身為東亞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設立於1906年，是德國境內第一個此類型博物館。1963年設立的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於2006年

起與之整併，正式成立為亞洲藝術博物館，即是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這項整併計畫，是屬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所規劃的洪堡計畫之一環，據悉，未來該館藏品將被規劃以非歐洲文物作品納入一項全球視之野展示框架內。自2017年一月起，亞洲藝術博物館也因此項計畫進行展品搬遷而暫時停止對外開放。本次考察，完全受惠於該館新任中國藝術主任愛古心博士（Dr. Birgitta Augustin）之鼎力支持，遂能於該館對外閉館期間申請特別提件研究。

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包含了早期印度與絲路等亞洲藝術，有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蘭卡、尼泊爾以及新疆與西藏等，另外中原地區、日本、韓國等。館藏中最常為人所知的部分，主要是中亞之壁畫、雕刻，屬於絲路藝術成就一環。至於中國書畫藝術部分，雖然數量並非特別突出，但其中明末清初的藏品則十分精采。此次兩整天的提件研究主軸，即是針對此段區間的畫作為主，選擇了不同特色的畫家，如有盛茂燁、弘仁、梅清、張宏、葉欣、龔賢、查士標、蕭雲從、樊圻、吳歷、戴本孝等人作品。此群作品中，雖有一些曾經美國學者高居翰在其關於十七世紀繪畫之鉅著Compelling Images中加以引用其中部分，但透過此次提件研究，在愛古心博士的細心安排中，能將同一畫家的不同作品，進行比對研究，並且可見各作之全冊或全卷等，是以能得有更為全面的認識與瞭解。



整體而言，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這批作品精采突出。其中能表現與說明的展覽內容十分多元，對於現階段所可推敲的研究課題而言，這些作品內容除了是能充分呼應高居翰特別關注的西方影響因素之外，更潛藏著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新議題。由於此部份資料本身，尚牽涉研究人員的個人研究論著成果，在此難以切實申論各部分細節，但大略可指出，其中多項議題都必然有助於本院籌劃一項具有全球世界網絡的十七世紀繪畫藝術展。特別，由於該館藏品品質精采，內容多能觸及這些畫家們的生平經歷、畫風來源以及交遊網絡等。筆者以為，經由這些作品內容之研究，若能與本院所藏品對照研究，並且透過更為密切的雙方互動以及長期持續進行研究交流，未來將能相輔相成地藉之發展成更有深度的展覽子題，得有機

會提出一個獨特視野來掌握十七世界的畫史脈動。而這樣的國際合作機緣，在此次拜會獲得對方研究人員的全力支持態度中，可說是已經取得了最好的敲門磚。

此外，這批柏林的繪畫藏品，多數能增補本院在十七世紀畫派中畫家代表性的不足，堪稱是本院需要借展的最關鍵對象之一。例如，屬於安徽畫家的梅清（1623-1697）在十七世紀繪畫藝術中是一具有獨特面貌的畫家，在本院所藏卻未能有代表之作。另外，金陵畫家的作品質量也會因此得有更多選擇性，例如樊圻（1616-?）是金陵八家之一，但在本院則不見藏品。葉欣、高岑等人則能有更為獨特、精采的作品可為代表。在十七世紀山水畫作中，不分地區的畫家對於「奇趣」的追求最顯熱衷，而此次所見作品不少就堪稱為此一趨向的重要例證。所謂的「奇」，實際上可能起於古風的追尋又或者是競逐於罕見的視覺樣態；在十七世紀的文化風潮中，無論對於奇特視覺效果的起源是否能有一致看法，但至少可知，對於尋奇、訪勝的目標亦已是重要風潮。

9月9日為週六，行程安排為考察柏林相關博物館機構之相關展示。當天一整天的相關考察活動，依據不同博物館與展覽活動，分項介紹如下：

2. 新博物館（Neues Museum）

新博物館（Neues Museum）的建築本身就是一項重要傳奇。此一建築由Friedrich August Stüler設計，建於1843年至1855年，但是在二次大戰期間該建築遭受嚴重破壞，成為一個被遺棄的地點。一直到2003年，由英國建築師David



Chipperfield事務所總責，將這個原本被

遺棄的建築物重新改造，目標在既可保有其經歷戰爭的痕跡，又能建設一座符合現代需求的博物館建築，遂成為一個難得的歷史建築改造案例。2009年，此歷史建築改建的博物館開幕，稱為新博物館Neues Museum，展示以地理和主題相關的柏林國立博物館藏品，彙整了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的埃及藝術品，以及Museum für Vor- und Frühgeschichte的古典文物等，意圖讓參觀者可從中看到地理的廣度與多樣性，從中東到大西洋、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史前文化和原始文化的發展。

此次前往期間，除該館的常態展出部分外，另得見一項與上海博物館共同合作的特展 China and Egypt: Cradles of the World。在此一合作特展，主要是由上海博物館借出其重要青銅器藏品，並與國家博物館之民族博物館、亞洲藝術博物館等藏品整合，成為一個能夠將中國與古埃及兩大文明相互比較的特展。總共展出近250件展品，時間跨度從西元前4500年到西元312年，雖兩個古文明相互間沒有接觸，透過展覽比較卻顯示出一些驚人的相似處。

展覽子題分為五個專題進行，分別展示：書寫，行政形式，宗教信仰，陪葬和日常生活。在一些展覽內容中，中國和埃及的藝術和文化顯示出令人驚訝的相關性，在另一些部分，有實則會顯示一些不同處。在此展覽中的亮點是一件徐州博物館藏西漢金縷玉衣，由2216件玉片組成，同時與一件來自古埃及的彩繪木乃伊對照展出。



3. 佩加蒙博物館 (Pergamonmuseum)

在博物館島上的博物館中，佩加蒙博物館 (Pergamonmuseum) 應該是必到景點。整個博物館島包圍五個博物館建築，整體規劃均可稱為十九世紀的文化遺產，早於1990年代就已經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近幾年，這個博物館島也因為洪堡計畫而大興土木。洪堡計畫，是屬於一個近年博物館界最為宏大但也十分具有爭議性的課題，其所牽涉各項因素十分複雜，並非本次考察，

佩加蒙博物館的展示，主要包含三項重要藏品來源：Antikensammlung, the Vorderasiatisches Museum, and the Museum für Islamische Kunst。因現在的改建工程影響，部分館藏不對外開放，此次參訪雖仍能看到部分重要藏品，但內部動線已大受影響。



原有的宏偉入口關閉，無法看到

Pergamon Altar (西元前180-160年)，不過Market Gate of Miletus (西元100年) 仍有開放。另外，館藏另一個重點文物就是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安那托利亞地區文物，最為人所知的巴比倫伊什塔爾城門Ishtar Gate與遊行大街Processional Way。該城門興建於西元前575年，為巴比倫內城的8個城門之一，館內重建的是較小的前門部分。最後，為希望拓展對亞洲藝術多元性的掌握，特別前往館內的伊斯蘭藝術展區，此部份亦屬於該館重要收藏主題。展示空間中除了常態的展出外，亦有小型特展活動規劃在展廳內。此期特展名為Testimonies of Faith. Biblical Traditions in the Islamic World，特別展出柏林國家圖書館和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宗教手稿，見證了中世紀基督教傳統的多樣性，展品時間從古代到19世紀。除了精美的亞美尼亞福音書，還包括敘利亞羊皮紙聖經，科普特紙莎草紙和其他基督教文物，以及該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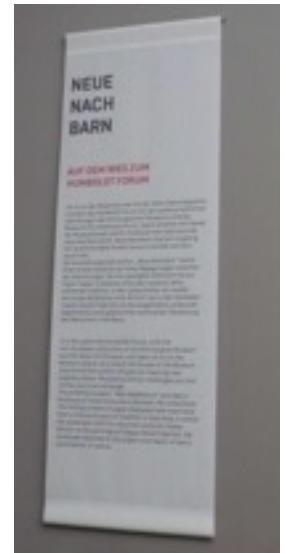
區許多其他語言的文物等，展示伊斯蘭傳統中聖經主題影響的各種例子。此類小型特展的構想與執行模式，很值得本院借鏡參照。相對於各種大規模的展示，此類小特展有意在有限的展覽空間（僅利用兩個小展廳），透過有限的展件深入淺出地說明在伊斯蘭世界中的聖經與相關文物。整體而言，這是一項善本資料與圖繪資料整合的展示，其展題設計的深度在於有效地利用跨區域的文化交流案例來引導觀眾提問與省思，並能提供更具有深度的學術研究觀察。在筆者考察當天，即見特展策展研究人員所規劃的小型研究參觀活動，大約有十多位參與人員一同互動，在作品展示空間中，針對作品的不同案例交換意見。

此一特展，也在提醒現今吾人思考展示課題之際，或可多增補文化史的關懷視野。置回本院個案，以未來擬要籌劃的十七世紀展而言，顯然很適合多採取文化互動的角度。所謂的文化互動，也不僅是指單純地東西兩個世界端點的往來、交流；更有趣的展現，若能有層次地透過「西」所假想的「東」，又或者「東」所認識的「西」來進行一個初步的引導，更活潑地利用這些當時觀眾的觀察角度來進行敘述，應該能對十七世紀的全球連動網絡有著更具魅力的吸引力。所謂的交流活動，正是一些人的往來與認識，而這些往來與認識都能透過文物本身，傳遞出不同的歷史意義。換言之，一個十七世紀的書畫展覽內容，單從中國內部文化的互動課題進行說明，自然顯得明確精要，但若是要有國際視野的策展態度，一個能夠兼採多元文化互動軸線的展覽主軸，顯然是有為者必要的抱負。

4. 古藝廊博物館 (Alte Nationalgalerie)

博物館島上的博物館舍都相當龐大，短短一日之內很難有機會全部參訪。在亞洲藝術博物館同仁的推薦下，為了能夠有效掌握與十七世紀展覽主題相關之比對內容，最後一個考察機構，筆者選擇了古藝廊博物館 (Alte Nationalgalerie)。這棟古藝廊博物館 (Alte Nationalgalerie) 原為國家藝廊所在，不過其原有收藏品也已經重新規劃，現分藏於Neue Nationalgalerie, the Hamburger Bahnhof – Museum für Gegenwart – Berlin等等不同機構。該建築於1990年代關閉維修後於2001重新開幕，現今的古藝廊博物館擁有1800件畫作、1500件雕塑，是一個主要展示十九世紀繪畫雕塑的空間，包涵了浪漫主義、印象派、以及德國寫實主義畫家Adolph Menzel的重要作品，另外典藏名作還有Caspar David Friedrich “Lonely Tree”, Karl Friedrich Schinkel “Gothic Church on a Rock by the Sea”等。此館也堪稱為歐洲第一個典藏印象派作品的博物館機構，1896年由當時的館長Hugo von Tschudi購藏Édouard Manet的“In the Conservatory”以及Claude Monet的“View of Vétheuil”等，可說是極具有前瞻眼光的購藏。

除了透過館藏能夠深入掌握十九世紀的藝術面貌外，亞洲藝術博物館同仁的推薦是因在此館三樓展廳，剛好特別設置了一個與未來洪堡計畫有關的展設空間，特別值得作為一個初步觀察個案。為了替洪堡計畫Humboldt Forum暖場，一項名為「New Neighbours」的活動開始於2017年六月至九月期間，旨在透過不同館藏文物的展示與對照，用以開啟一連串不同的對話主題。本次，筆者所見的小型陳設是以山水題材作為共通元素，將德國山水畫Caspar David Friedrich乃至於日本的山水屏風等共同陳列，企圖讓觀者能有不同的感受。這個展示空間的



規劃，可能是有意提供觀者更多自主的觀察，因此，在整個展場中，對於相關的文物說明並沒有過多標誌或解說。例如，被放置在正中央的日本六扇一曲山水屏風的標籤，就只有簡短的品名（The West Lake near Hangzhou）、材質介紹、創作時代與館藏編號等訊息。這樣簡略的說明文字，是否能有效傳達此件不同文化作品的價值與意義，可能尚有待評估其成效。若是以筆者在當場的觀察，不難注意到多數的參觀者仍以牆壁上的歐洲山水畫為主，對於在空間正中央的此件日本屏風，則多將之視為空間中的裝飾品，甚少有人停留駐足。

跨文化的觀察模式，在國際博物館界中早已是十分重要的展示手法之一。然而，除了展覽主題的設想之外，其所展示內容的深入程度，乃至於展示技巧、展示配件等的共同成果，都可說是其成敗關鍵，各個環節均能發揮不同影響與作用。在這個山水主題的規劃中，初步的設想概念十分有意思，例如，選件的考慮顯然是有經過評估的結果，Caspar David Friedrich不過，由於缺乏對於展示文物之深刻內容說明（無論是展示文字，或者提供語音導覽內容均可），這樣的展示雖然能讓觀者有更多自主權，卻也造成策展方無法積極引導觀看；整體而言是一個不夠完備的展示。現代博物館的主要功能，在透過文物展示進行文化教育，無論是採何種文化觀點，關鍵在於博物館本身必須要有積極參與「教育」之目的與企圖。正也因此，對於展示手法與其成效的評估，應該是博物館不可或缺的一環。總言之，除了追求展示設計的創新與美感之外，成效的評估更是一個國際博物館力爭卓越的必要手段。可惜，這類的展覽評估業務，在國內的博物館事業中的推動也尚未有明確進展。

（三）荷蘭阿姆斯特丹（9/10-13）：

在柏林進入考察第九天(9月10日)，此日為週日也是交通移動時間，當天上午自柏林飛往阿姆斯特丹。午後抵達阿姆斯特丹後，因仍有兩小時時間，前往旅館附近之梵谷博物館，特別使用此館的多功能語音導覽設備，得到一個充分認識館藏梵谷作品的絕佳自我學習機會。在阿姆斯特丹的後續三日（9月11, 12, 13日），此行是以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為主要

考察機構，核心工作在於與該館中國藝術研究員王靜靈博士共同提件研究，並評估討論未來合作十七世紀特展之可能性與相關展品內容等。此外，由於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重要性，近年在國際間極速躍升，筆者也盡力於考察期間掌握並思考該館如何能在二十一世紀重整新貌後，立刻成為國際間的重要博物館機構。工作細節與相關日程，依序分別說明如下。



1.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考察第十天（9月11日），首先拜訪該館中國藝術研究員王靜靈博士，與其共同前往版畫庫房，進行幾件相關版畫的資料確認。其後，由於筆者為首次到訪，本日工作規劃主要是在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考察常設展區。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確實不亞於其他歐洲博物館機構，早在1800年就以‘Nationale Kunstgalerij’之名於Hague開放，不久搬至Dam Square的Royal Palace。一直到威廉一世即位後，又將繪畫與版畫等移到Kloveniersburgwal，隨著荷蘭歷史與藝術館藏的併入，成為後來收藏的歷史部門、雕塑與應用藝術部門。此一博物館的成立，可說是在法國建立國家博物館後的追隨案例，1798年11月19日，在巴塔維亞共和國成立三年後，政府在Issac Gogel（財政部長）的建議下，決定建立國家博物館。博物館最初收藏了藏品收藏的遺物和來自國家機構的各種物品，其後才有陸續的購藏動作，第一任館長C. S. Roos任內以100荷蘭幣採購了第一件藏品（Jan Asselijn, “The Swan”至今仍是重要館藏）。在政體更替的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收藏一直有不同的館藏地點。一直到1876年才於現址由建築師Pierre Cuypers為Rijksmuseum設計了一個將哥特式和文藝復興風格結合在一起的建築風格。不過，隨著館藏成長，這個十九世紀的建築也不斷擴建。在1945年代後，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捐贈，成為亞洲藝術部門之先機。自2004年開始，一個長達十年的改建計畫完成，2013年五月重新開幕，在西班牙建築團隊的規劃下，將原來不相連又暗沉的陳舊空間脫去舊貌，給予一個穩重開放又能保有古典風格的門廳與內裝，特別是在亞洲藝術陳列室部分均是此次改建後新空間。

二十一世紀以來，不少國際博物館均面臨館舍陳舊的改建挑戰。Rijksmuseum可說是此中難得的成功案例之一。筆者僅從參觀者的角度進行思考，個人以為其主要入口的公共空間規劃最具成效，這個空間的成功條件亦值得本院借鏡思考。實際上，Rijksmuseum的腹地有限，其建築的先天條件也十分不妥。在1880年代興建時，所保有的廊道問題，一直以來就是這個博物館的困擾。在2004年改建以來，也一度計畫封閉該廊道，但在與自行車團體訴訟後敗

訴，遂而恢復廊道通車之作法。這個沸沸揚揚的公民課題，曾引發國際公民團體的熱門關注焦點。但整體而言，建築團隊的解決手法十分成功，只要在將公共廊廳往地下一層移動，拆去厚重遮光的屋頂後，讓原來昏暗的陳舊空間換上全新面貌，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大廳成為新的入口，雖然其建築本亦不是高挑空間，卻因此一調整而有著絕佳的空間感。

此次考察的亞洲藝術的陳列部分由於是全新擴建，其建築之空間感與整體規劃也同樣具有相似的效果，而其雕刻作品展示區甚至保有自然光線，為展覽空間提供更多現代感，為參觀動線與光景提供更多自然動態因素。在展示的空間之中，展出文物與其周圍環境的巧妙配合，讓文物陳列也成為一個重要空間端景，有效地讓文物展



示還具有空間運用上的詩意。整體而言，這個亞洲藝術的展覽空間，確實是一個具有質感的陳設。



館收藏的絕佳空間。

在這個延伸的畫廊空間中，又分為至少十個各個獨立的展覽區，各區依據畫家放置作品，短短幾步距離，就能看到十七世紀名家的精采傑作，例如Hals, Steen, Vermeer, 以及Rembrandt。

2. 阿姆斯特丹的其他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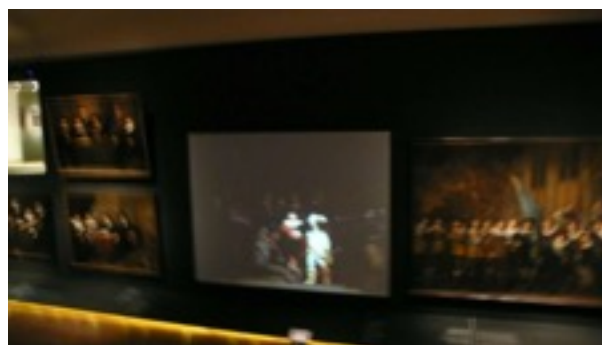
考察第十一天（9月12日），一方面繼續參觀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其他展廳，並在完成相關考察後，在同行建議下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另外兩個相關博物館。由於十七世紀航海時代之文化成果，在阿姆斯特丹海事博物館中有不同角度的呈現，此次考察也特別排入參訪行程。海事博物館（Het Scheepvaartmuseum, The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與一般文物藏品為主的博物館不同，主要透過海洋活動之相關物品進行展覽內容的規劃。其中包括，一艘停在博物館臨海港邊的東印度商船複製品，提供觀眾得以親自進入船中，實際體驗十七世紀遠洋航運的生活實態。此外，有多項展覽提供海洋知識、星座指標、船隻構造、城市與海洋生活各種不同面向的展示內容。展示內容多融合文物與多媒體內容，其中如‘See you in the Golden Age’展區，就利用了影片人物與真實參觀者進行互動一般的展示手法，很能迎合年輕族群的觀展經驗。

不過，對於這方面的展示手法，筆者以為只能用於啟蒙、引導，後續的文化教育若是條件許可，仍須回歸豐富的歷史文物來增加認識的深度。以阿姆斯特丹為例，在此一城市中由於同時有海事博物館與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二者角色略有出入，從參觀群加以觀察即可知道，大約學前兒童或者小學生



群體會以海事博物館為主要參觀處所。但是中學以上青少年團體，仍似乎是前往具有豐富文物知識內容的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而這樣的一個傾向，也能提醒吾人在發展數位媒體與文物展示的運用上，應該隨時反思數位展示是否能有效引導觀者回歸文物本體，甚至於吸

引其投入對於藝術文化內容之興趣。而非僅是利用數位工具轉移焦點，卻未能實質喚起觀者對於藝術作品本身的認識與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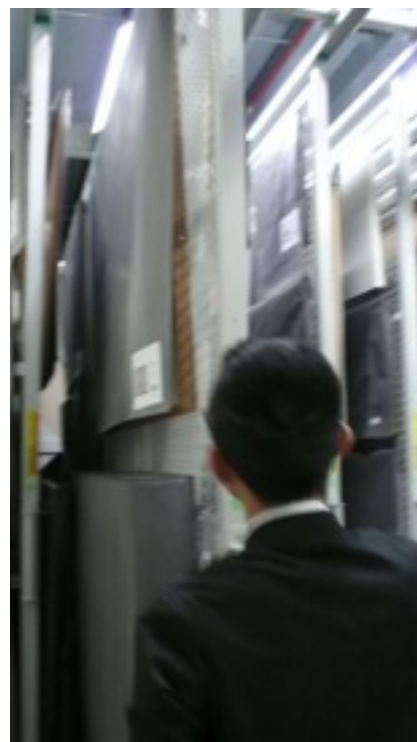


接著，筆者前往Hermitage Amsterdam，此為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在阿姆斯特丹的分館。館址的建築本身，原是一處自十七世紀就已開辦的養老院所，1953年開始稱為Amstelhof，在二十世紀後期逐漸不再適合作為收留院所之後，於2007年改為莫斯科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的荷蘭分館。全新改裝後館舍於2009年重新開放，此館也被納入國家博物館組織機構，因此，除了來自冬宮博物館的藏品展覽外，也有來自不同國家博物館內的作品，共同組成常設展覽。此次前往考察期間，來自冬宮博物館的展覽為1917. Romanovs & Revolution, The End of Monarchy，展示末代沙皇Emperor Nicholas II及其家庭成員的生活與遭遇。常態展為十七世紀荷蘭肖像畫展，是由來自Amsterdam Museum 與 Rijksmuseum的三十件藏品共同組成的肖像畫特展，可以說是與林布蘭特名作〈夜巡〉畫中人物角色相關的人物肖像畫作，也能展現荷蘭十七世紀的城市生活與人際關係網絡。從展示設計而言，此一肖像特展還特別運用了影音效果配合展品，利用旁白介紹、並輔以光線控制等，希望能讓觀眾更有親近畫中人物角色的看展經驗。

此日的最後一處考察對象為Rembrandt House Museum。由於阿姆斯特丹並非大城市，今日的考察路線均在走路十五分鐘左右可達距離，阿姆斯特丹真可說是一個便利的文化之都。Rembrandt House是一個荷蘭舊式城屋建築，過去曾為林布蘭特的住屋與工作室。現址除意圖展示其原有使用空間情況外，也在其中安排藝術家現場解說相關藝術製作活動，例如版畫印製、油畫顏料的調配等等。對於第一次到訪的觀眾而言，提供了各種不同面向的相關知識，雖然是一處規模不大的博物館，卻有著獨到的展示活動安排，一直是阿姆斯特丹相當吸引人的小博物館。

3.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庫房提件研究

考察第十二日（9月13日）為最後一日的考察行程，今日全天前往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位於阿姆斯特丹城外郊區之庫房，與該館中國藝術研究員王靜靈博士共同提件研究。前往該館庫房提件必須事先申請，此次因該館研究員王



博士的全力支持與陪同，得以全天在該館庫房內共同進行提件研究工作。此次所調閱作品，主要以規劃十七世紀展之相關子題為核心，並擴及一些其他相關可能展品。由於荷蘭國家博物館的館藏特色與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並不相同，相較於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所能展現的徽



州、江南或南京等地區的畫家作品，荷蘭國家博物館的藏品更在顯示其具有歐洲影響之特色。換言之，這些在荷蘭國家博物館所見的館藏作品，可能並非典型的中國繪畫風貌，但正因此，反而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色。

其中由於多數仍牽涉該館研究人員個人心得與研究成果，相關討論細節擬不全錄，但可舉出其中與未來策展需要相關部分進行說明。例如，王靜靈博士發現一件館藏畫作的獨特面貌，極力推薦其可作為未來策展重點。該作為一幅海港全覽圖（Fuzhou）設色清淡，其採鳥瞰視點的手法與十七世紀畫家張宏的畫冊畫風似有聯繫。此作堪稱本次合作策展的重要核心作品，將能提供策展雙方從不同角度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與論述，此作品現為王靜靈博士重要研究素材之一，未來其成果正能運用或開啟相關的展覽子題，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項重要資料。此外，上下午各三個小時的工作時段，還針對數件館藏青綠山水畫卷進行觀察，並探討所藏歸入晚明畫家名下的一些宗教題材畫作。同時，也針對十七世紀的可能女性畫家作品，作了一些深入考察與分析討論。

筆者此行，雖僅有一日的庫房工作機會，但除了得以仔細查看相關繪畫作品二十餘件外，尚得在亞洲藝術庫房內查檢其他陶瓷作品，機會實屬難得。筆者衷心感謝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王靜靈博士不吝分享個人研究所得，也期待雙方能有實際的合作機會，於本院規劃一個能夠跨越地理區域限制的十七世紀亞洲繪畫藝術特展。

參、考察心得

一、書畫專業方面：追求故宮的國際新定位

從世界級國際博物館的組織架構與專業角度看，各館業務之成功展現，全仰賴文物典藏與研究人力兩方面的有效整合。因筆者曾獲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獎學金，於該館亞洲藝術部任客座研究員（Research Fellow）一年，兼此次與歐洲英國、德國、荷蘭三個國家博物館考察並與研究人員交流經驗，側面觀察並體會到一項重要卻經常被忽視的事實，亦即是，本院因文物典藏需要所設立的四處（書畫、器物、圖書文獻、南院處）研究人員編組與其有效發展，堪為本院在國際博物館事業上最重要的資產，並可競爭國際地位之最主要能量源頭。可惜，長年被現行多種常態業務所遮掩其可能性。以下，以筆者專業的書畫部分為例，但實則牽涉全體文物研究專業角色。

1. 書畫研究人力的獨特角色：

故宮來台之後的價值可從很多層面說明，但其中能爭取國際地位的最關鍵成果，在於其獨特典藏所培育的研究人員。這個部分的成果，國際間的認識遠比本院內部人員對自己的認識還清晰。經由此次提件研究，筆者深刻體會到故宮書畫的典藏特色，堪稱是現今存世的中國書畫作品群中最具關鍵代表性者，部分作品之作用甚可說是有研究「標尺」之特色。然而，文物的特質，需仰賴研究人員長期深入掌握與辨析，由故宮因文物典藏業務過程中，積極自我培育研究視野，並長年投入此一收藏的研究人力，才會是最重要的文物代言人。故宮書畫研究人力，應有此自我認識並自我要求專業上的精進。

2. 國際各項書畫研究活動的積極參與：爭取文物話語權

從國際博物館的編組來看，亞洲文物藝術方面的研究人力都十分匱乏。相較之下，故宮組織內具有將近五十多位博碩士級研究人力，是十分重要的資產。這份獨特資產，若從營運的角度看，多被視為一種人力成本，是一種支出。這實在是一種不明白博物館典藏與專業價值的誤解。故宮典藏文物的價值，若沒有透過研究人員解讀、傳譯，其價值不過只是空話，是建築在沙地上的短暫成品，無法真正深化為文化能量。故宮在台灣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透過這一獨特組織，不斷培育出具備有深厚文物知識的解讀、研究者，進而能與國際間的其他專業人士互動、對話，一再爭取文物的話語權而來。直言之，國寶文物不能說話，其形成關鍵在人的努力研究與解讀傳達，而非源自其他。

3. 積極與各國策展研究人員交流合作：不再「代工」，要提出新的書畫研究觀點

國際業務的交流，並非僅是文物的往返。故宮在幾次國際交流展中，雖多意圖決策其策展主軸與研究觀點。不過，從近年的國際策展模式看來，目前仍多是由外部提出企劃，經內部查核後同意或商議清單的作法。這也意味著，策展活動被當做一種類似「代工」的執行方式。無論該展覽圖錄文字由何人轉寫，專業核心策展理念卻已非由內部人員發展。長久此往，故

宮典藏的核心價值將不被關注，僅一再被外部研究者隨著其研究所需而恣意支配、取用。這表面似乎是典藏公開後的必然趨勢，但故宮本身仍須務實認識到一個文物典藏的研究能量，需要有內部常態行的深厚培育。本院培育內部研究人力，正是積極對外公開典藏的重要手段。從書畫的研究而言，從既有典藏中找尋值得深入的課題，才是發揮競爭力的關鍵。

本次所擬籌辦的十七世紀書畫藝術特展，正是要將本院藏品中十七世紀藏品作為一個研究基礎，利用院藏品的特色，與國際策展團隊對話，並且主動爭取院外文物成為此一對話框架的展品，將過去的被動角色，轉化為一個更具雙方互惠成果的新合作策展模式。

二、策展教育方面：從「讓」文物說話到「替」文物說話

策畫展覽的成功要素，必須要能有效展現展覽之「觀點」。此次所考察的各式特展，無論大小，其所預設的展覽觀點均有其創意。其中，搭配這個策展觀點的展示手法，則是展覽成被的第二項關鍵。值得自我提醒的是，現今各館對於「文物」解釋均十分看重，但是陳列的手法或搭配的說明呈現方式，卻非僅止於說明文字的搭配而已。「替」文物說話的手法很多，目前這種搭配文物的解說方式，在日本方面，特別強調「語音導覽」，而在歐美方面則逐漸從語音導覽走向「多媒體導覽」或者積極利用個人手機等載具，透過APP方式下載各式輔助解說之內容。在展覽中，不同文物的組成，就如一場表演藝術的進行，除了主角是文物之外，演出內容的故事軸線是否成功，配合演出的聲光、舞台等環境裝置手法等等都是重要條件。作為策展人，與其說是只是一位說故事的人（劇本的創作者）之外，更應該扮演著導演的角色，具備有思考整場演出的關鍵特色應如何呈現。而其他的配合團隊，當然不該是不出聲的執行者，而是同樣具備有相對應專業的其他專業人士，如此的合作才可能有真正的成效。這麼而言，作為策展人「替」文物說話的挑戰，基本上是十分嚴峻的任務，除了專業的知識與研究能力外，也更需要組織架構的支持與輔助，其自我的要求自然必須有極高標準。

針對策展內容的輔助，荷蘭國家博物館均積極利用免費語音下載，讓觀眾均得以利用個人手機下載內容後，聽到所有語音導覽內容，而不需完全借助於館方提供的語音導覽器。此外，也有博物館加強館方導覽器的內容與設備，例如英國的國家藝廊就在導覽器上提供更多影片、甚至於研究人員訪談檔等，讓觀眾雖是自行參觀，卻有能隨時得到不同專業的館方人員進行說明介紹。從被動的教育單位，現在更多博物館更企圖扮演著更積極的主動教育單位。

肆、相關建議

一、國際策展團隊的籌組、整合國際文化力

此次考察過程特別能感受故宮必須要積極爭取國際角色，從此次為籌設十七世紀特展的目標而言，一個邀集國際研究人員共同參與的國際策展團隊勢在必行。從策展的角度而言，一個國際策展團隊應能提供更大成效。一方面，是可借助國際其他館藏機構之藏品來增補文物知識，另一方面故宮研究人員也能因此取得與相關國際機構之研究人員的互動關係。此次，若

設立此一國際策展團隊，其目標更在於雙方互惠的對話經驗，透過對話啟動一個更具深度的研究整合方式。

二、新的工作模式、多國語言的呈現

至於一個國際策展團隊的工作模式，雖本院歷來已有許多國際合作展出機會，但是，此次在考察過程中，交流更重要的是研究過程中的對話。是以，為能有效地推動其研究成果之運用，一個新的工作模式也值得思考。首先，國際策展團隊的整合，目標應該是為能相互激盪研究思考，並且相互增補各種研究內容之認識。對於實質的合作成果，因一新的工作模式之調整，未來可評估實質展示成果之分工，乃至於分地展示之可能性；而對於出版著作成品之型態，因有國際團隊之人力，未來可追求多語言版本之出版規劃，甚至於積極朝向全球市場的預設來進行出版品內容之考慮。

三、說一個文物的故事，用不同的視點

此次針對十七世紀特展的籌設，除了利用故宮既有藏品之外，最關鍵的整合來自於國際不同書畫典藏機構。目前雖僅是歐洲機構的考察，但因為故宮研究人員一直有不同機會參與國際策展，此部份經驗的累積，也能厚植後續與其他相關機構繼續發展相關合作模式。這樣的研究整合，將更能凸顯國際視野，提昇本院研究成果的國際能見度。而從共同合作所成就的目標來說，一個兼容並蓄、尊重對話的研究過程，將有效實質展現不同的視點。一個文物的故事，本來僅僅屬於研究者個別的闡述，透過多方對話、展覽推廣，這樣的文物故事得以收納更多元的意見，更能展現故宮的文化力，其實是一個具備世界公民共享的重要資產。